

论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辛 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全国人民自从有了党的领导，只用二十八年的时间就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只用七年时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写下了中国历史的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今天，正当我国人民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一下指引我们走进社会主义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制定和公布的经过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通常

简称为“一化三改”。它是在一九五二年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经党中央通过后，在一九五三年宣布的。但是，它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那次全会所作的决议中，就已经基本论述过了。

这条总路线，是党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射中中国实际之“的”的典范之一。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隔着一座万里长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时期。正是以这些理论为指针，所以我们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开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科学和艺术上不同流派和风格的矛盾，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矛盾，等等。不能搞无限上纲，动辄抓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矛盾情况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认识上的是非问题只能通过“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则主要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同时配合以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学术上的争论，则主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如此等等。到处去贴“阶级斗争”的标签，挥午阶级斗争的棍棒，只能破坏党内和人民内部民主，挫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甚至可能使矛盾激化。例如，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条

件下的民族关系，错误地说成“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伤害了许多民族干部和群众。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现阶段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总之，如《决议》所指出的：“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

第三，必须区别阶级斗争中的敌我矛盾和

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革命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已从过去的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全国。全国的经济成分，将和过去的革命根据地一样，主要有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有必要也有可能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决定性胜利还不是彻底胜利，可能也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建国头三年，我们还得用很大力量去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特别是新解放区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那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的是把官僚垄断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的所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之后，才能对包括个体农业在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就到了一九五二年才提出，并在一九五三年宣布和全面

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实行专政，运用法律武器予以打击，决不能手软。对于其中罪行严重、危害极大的犯罪分子，还必须从严从重，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范围内，依法惩处，以保障和巩固健全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否则，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现阶段，一般扰乱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成分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剥削阶级分子和旧社会的渣滓，那么，现在则主要是发生在人民内部，绝大多数是青少年，包括青年工人和学生，是基本群众的子弟，总之是新社会长大的。对于这些人，我们一方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肃加以处理，另一方面，又要抓紧进行教育，做感化和挽救的工作。至于由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党内和人民内部产生的无产阶级

着手进行。有人说，我国没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一夜之间就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显然不符合史实。

二、历史的必然

这条总路线以“一化”为“主体”，“三改”为“两翼”，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等原理为指针，是出自历史的必然。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旧中国的工业虽然很少，但机械化、社会化的现代工业也已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它们又极为集中，最大和最主要的资本都属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它们控制着全国经济命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把它们改造过来后，加上革命根据地原有的国营经济，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援建的工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企

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更是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简单粗暴，更不能颠倒敌我，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总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最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防止重犯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也才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克服否认、忽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的右的错误，始终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业也就越来越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它们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本来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但是，由于它们本性唯利是图，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它们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却越来越不适应，它们所拥有的生产力也越来越难发挥出来。例如，拿私人企业中最发达的纺织部门来说，一九五二年的劳动生产率就已下降到只相当于国营纺织业的百分之七十六，一九五五年更下降为百分之五十七。因此，也就有必要和有可能把它们改造成全民所有制企业。

全国土地改革后的个体农业，如果孤立地看，同它们的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但是，它们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却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粮食、原料和市场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它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极易出现两极分化，使广大贫农、下中农重新沦为被剥削者。因此，引导它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也就不仅是全社会的要求，而且首先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的愿望。就近组成合作社，即便生产资料照旧，通过小规模、简单的分工和协作，也会创造出一种集体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既可以使农民共同富裕，又可以进一步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而工业发展了，又会促进农业现代化，使工农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比翼双飞。

当时个体手工业情况和个体农业大体相同。

总之，不管是从“一化”来看，还是从“三改”来看，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和付诸实施，都是非常及时完全必要的。

三、适合国情的政策

为了实现“一化三改”，我们党制定了各项切实可行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看来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实质。

拿社会主义工业化来说，由于开始缺乏经验，对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都曾不得不照搬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经验。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成教条，而是不断根据我国国情加以消化。例如，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是采用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张的。这种主张当然不适用于重工业过重的情况。但是，我们在“一五”期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重工业极少，如果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建设就会得不到必要的、急需的装备、原材料和燃料，就发展不起来。同时，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注意从国力出发，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重、轻、农的协调发展，以及基本建设中的“骨头”和“肉”的关系。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上是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开始时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也为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建设所必须。但是，照搬一个时期后，我们也逐步发现这套统得过多、过死的体制不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并陆续提出了好些可以克服这种弊病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春末作的《论十大关系》和同年秋后召开的党的八大的主要文件，都是党这个时期在经济建设中的智慧的结晶，至今对我们仍有指导作用。

在“三改”方面，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道路。

首先，我们不仅把劳动者私有制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民族工商业严格区别开，把前者改造成为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把后者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而且把两种改造结合起来进行，割断资本主义同小商品经济的联系，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小私有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受到限制，从而推动了两重改造的互相促进和顺利实现。

其次，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也皆适合它们各自的特点，并普遍采用了典型示范、逐步过渡的方法。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我们党除了根据土地改革后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制定了依靠贫民、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以外，还规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首先组成几户到十几户的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集体劳动互助组，而后发展成为以土地入股分红、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发展成为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按劳分配产品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规定：逐步过渡时，要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家庭的收入随集体生产的增产而逐年有所增加，把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变成农民共同富裕的过程。

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分三个步骤：先是组成合作小组，集体向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购买原料，销售产品，参加小组的手工业者仍然独立生产；供销小组积累了一定公共财产后，就可以发展成为供销合作社，由合作社负责供给原料、销售产品，并开始实行生产中的分工和协作；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集体生产，就变成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根据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和他们的企业在过渡时期的二重性作用，我们也创造了由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三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他们实行和平赎买。其中，初级形式是收购产品、批购零销；中级形式是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代购代销；高级形式是单个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只在一定时期内领取定息，这种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取消定息后，就成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由于上述各项政策都切合实际，再加上典型示范、逐步过渡的办法，被改造者自然易于根据亲身经验，逐步认清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所以，不仅广大劳动者乐于走合作化的道路，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大勉强地接受了赎买。

四、实践的检验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原定“一化三改”完成的时间是十五年，但是，实际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三改”。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打破了生产关系大变动时期生产会下降的历史常规，创造了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工农业生产节节上升的大好局面。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这些史实说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国家和人民的幸福线。

当然，过渡时期的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一个由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进行的改天换地的大运动中，哪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当年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改造后期改得太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在经济管理上，也有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偏向。如此等等。否则，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可能还更大。同时，党的八大主要文件对这些缺点和错误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了改正的措施。所以这些缺点和错误与整个运动的成就相比，毕竟是瑕不掩瑜。

我们建国以来的大不幸，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好些年里，常受左的错误的干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由于被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更推到了极端，危害极大，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

但是，林彪、“四人帮”毕竟已被粉碎。党的几次左倾错误也已由党自己起来纠正。并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党对这些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全面总结，弄清了错误的性质、内容和根源，指明了避勉重犯的途径。而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的整个国民经济，成绩是很显著的。我们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

的生产条件和耕作方法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〇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已增长二十六倍多,粮食增长近一倍,人民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也提高了近一倍。这些成就的获得主观因素当然是党和广大干部、群众都能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客观原因则显然是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进一步证明,作为照耀着我们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灯塔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全国人民来说,不仅是在过渡时期的幸福线,而且也是过渡时期结束以来的幸福线。

五、两种似是实非的观点

为了正确全面认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两种错误看法必须加以澄清。

一是以列宁在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即一九二一年第二季度,关于当时俄国还不能从小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无产阶级国家应该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同盟来反对小生产的论述为依据,来否定我国建国头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但是,列宁这些论述却只是针对当时俄国的特殊情况而言,把它们当作普遍真理是荒谬的。当时俄国的基本经济情况是,经过四年世界大战和三年国内战争,加上内战期间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误,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已破坏殆尽,农业连年歉收,贫困、饥饿笼罩着全国;在国民经济成分中占绝对优势的小商品生产,不仅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到处投机倒把,成为加剧贫困和饥饿的“主要敌人”;而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却可以活跃工农业之间的实物交换(当时还禁止货币流通),恢复工农业生产,促进社会主义。正因为列宁的论述是从上述特殊情况出发,所以,一九二二年三、四月间,当俄国的粮荒有所减轻,工业有所恢复,列宁就着重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

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是同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并宣布退却已经结束。(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18、626页。)一九二三年初俄国的经济情况进一步好转,大工业的恢复较预期的快了些,列宁在重病时口授的遗著中更进一步指出: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合作企业“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6、687页。)

二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是工农业生产都高度机械化和社会化、实现了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在全社会实行同样的按劳分配、消灭了商品、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的论述为依据,来否定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看法也似是实非。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曾不得不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即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抽掉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本质属性,只把它们的本质属性加以概括。经过这样抽象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消灭了手工劳动和小生产,工农业生产都已机械化和社会化,社会产品和劳动力都是商品,社会关系已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社会。这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剥夺者以后,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会具备以上的特征。但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纯粹的、没有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过程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会有的。因此,他们更注重于用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去揭示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向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具体规律。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也指出: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农还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后,将是全社会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社会,并且可以让个体农民继续存在到他愿意参加合作社为

(下转第31页)

环”，不能或暂时不能为增产最终产品——消费品服务，不能顺利地转化为消费力；还有一部分因规格、品种不对路，连在重工业“自我循环”中也用不上，成为积压物资，即无效产品。消费资料在工业产品中所占比重过小，又有一部分不适销对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也成了积压物资、无效产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工业产品虽然增加得不少，但真正适合社会需要（包括生产需要和消费需要）的有效产品却不够多，能够顺利地转化为消费力的产品就更加有限，所以人民得到的实惠也就比较少；不仅如此，这种状况还阻碍了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正常循环，迫使我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进行“关停并转”的大调整。

我国过去对社会消费力的第二、第三个反作用运用得不够好，突出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有些同志并未真正承认劳动力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他们一说发展生产，眼睛就只盯着生产资料的追加，忘记了通过追加消费来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见物不见人”。所以就一股劲地搞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对建设新厂、增加设备劲头很大，花钱大手大脚，不管社会是否需要也争着要上，达到“不惜血本”的狂热程度；对改

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却不大关心，特别是对发展教育事业甚为轻视，花钱过于“吝啬”。结果是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劳动者的体质改善和智力开发，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不懂得利用我国的巨大国内市场，不懂得通过扩大消费来刺激生产，反而采用片面限制消费力的办法来束缚生产力，结果是“作茧自缚”。

总之，多年来我国不大注意研究、利用和发挥社会消费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是相当失策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够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粗浅意见，只是挂一漏万地讨论了社会消费力的若干问题，对社会消费关系问题（即消费者与消费资料、消费劳务相结合的社会形式问题）尚未涉及，还形不成对社会消费结构的整体看法。我认为，要全面地研究我国的经济结构，逐步探索出一条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途径，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这方面的讨论似有积极展开之必要。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列宁《市场理论问题述评》。

（上接第14页）

止。为了促进农民的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应该以“资金”或“金钱”，通过“贷款”的方式去扶助。这就说明，他们在实际上也认为：只要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生产资料公有制已成为主体，按劳分配已在城乡初步实行，即使还存在手工劳动，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还存在商品和货币，还存在着工农差别，这样的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是绝对不能分割的。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两种论述也是绝对不能分割的。把两种论述割裂开来，并且用前者否定后者，其实质就是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和实质的。

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中写道：“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的愈深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65页）今天，我们来回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也应该说：在这条路线指引下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条路线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无价之宝。只要我们坚持和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